

文章编号:1005-0523(2012)05-0083-05

#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诗学视域下的诗史重构

杨龙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当代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诗学着眼于诗歌的审美创造活动,通过“影响的焦虑”命题下对事实性与修正的辩证分析,实际着重阐发了一种“反影响”诗学,并最终从审美僭越历史,对影响的诗史做互文性阐释和重构。布鲁姆影响诗学视域下的诗史重构,陷入了审美与历史的深刻矛盾,同时又以其审美主义偏执激化了这一矛盾,难以达到文学史的整体性再现。对此,回归文学史的历史性和语境化,当足以药石之。

**关键词:**影响诗学;文学史;历史;审美;语境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当代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被普遍认为是研究文学影响而卓有成就的杰出批评家。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发表诗学名著《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1973)肇其端,并喷式地接连抛出了《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 1975)、《卡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 1976)、《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 1976),这些书一起构成一个“影响诗学”四部曲。

此前,布鲁姆原本以研究浪漫主义诗歌起家,并长期浸淫其中,撰写了一系列浪漫主义英语诗歌批评论著。当他试图提出一种诗歌理论的时候,自然流露出强烈的浪漫主义观念意绪(特别是主体主义和审美主义),同时也着意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个案式诗歌批评成果(主要是专门的诗人研究),升华至具有历史普遍性的理论范式,从彼此支离、颇不相属的诗歌批评迈向连贯统一的诗史概括。这样的诗学设计之途,首当其冲地陷入审美与历史的矛盾纠结。对此,布鲁姆通过他的影响诗学,建立了特定的理论视域,有力地阐发了一套独特的关于诗歌传统与创造的辩证法,并借以对诗史进行了别具一格的重构。随其创新性“光晕”(aura)日渐消褪,布鲁姆的这种诗史重构,在大放其深刻洞见之异彩的同时,愈益引人注意到其固有的理论偏执,迄今仍有必要作出进一步清理和省思。

## 1 影响的焦虑:事实性与修正

很大程度上,由于布鲁姆或隐或显、错杂交织的多种理论资源假借,以及丰富新颖而又不乏险怪生涩的术语发明,他的影响诗学常常显得迂曲繁复,让人乍窥之下难觅其究竟。实际上,在建构影响诗学之初,布鲁姆即已和盘托出了他最根本的诗学理念,且特别集中概括为那个最著名、也最核心的命题——“影响的焦虑”。所谓“影响的焦虑”,理解起来非但并不复杂,反而别有意趣,围绕于此,论者如云,但恐怕多流于就事论事,并未寻绎其内在逻辑起点。

应该说,布鲁姆的诗学关注始终是诗歌创造,但他却将自己的诗学起点选定在对诗歌传统的关切与思考。由此出发,他捕捉到了他的诗学关键词——“影响”,并进而树立了自己深刻而异乎寻常的“影响”概念:“我所说的‘诗的影响’并不是指早期诗人把观念和意象传递给后来的诗人。”<sup>[1]72</sup>“我所称的‘影响’乃是一种对诗本身的比喻表达;不是作为产品与来源的关系,或效果与原因的关系,而是作为后来的诗人同前

收稿日期:2011-07-18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08WX10)

作者简介:杨龙(1979—),男,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诗学比较、20世纪西方文学与文化。

驱者的更重大的关系,或者是读者与文本、诗歌与想象、想象与我们生活整体的关系。”<sup>[2]70-71</sup>因此,布鲁姆对于影响与传统之间关系的考论,绝非着眼于渊源批评或因果推理,而是将传统所牵涉的先在与迟来者的种种关系形式列为对诗歌影响的赫然见证,以此奠定自己的诗学前提,即影响的事实性。

为了阐明自己独特的理论意图,布鲁姆自创了“facticity”(事实性)一词:“‘事实性’意指着某一事实的状态,比如说,一个不可回避和不可变更的事实。陷入事实性,也就是陷入不可回避和不可变更之中。”<sup>[3]99</sup>诗歌影响的事实性是一种状态,一种迟来者必须去直面的先在事实,即源自前驱诗人的先在性。“任何一位诗人,我修改为任何一位强劲有力度的诗人,像任何人不能选择他的父亲一样,不能选择他的前驱。……诗人们……最深层的欲望是变成影响,而不是受别人影响,然而,甚至在志得意满的最强劲有力度的诗人中间,仍然保持着那种被影响的焦虑。”<sup>[2]10</sup>据此,布鲁姆确定了“父亲荫底下”的、不可逆转的事实性,“文学影响的最大真实性在于它是一种无法抵制的焦虑。”<sup>[4]68</sup>

与此同时,布鲁姆对诗歌影响的事实性的价值解剖,又与他对诗人之作为创造主体的强烈关切紧密相联,他坚持认为:“影响始终是被定为中心的主体,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联系”<sup>[2]77</sup>。基于此,布鲁姆转而对批判锋芒直指事实性崇拜。在他看来,诗歌影响的事实性的终极价值,惟在于激起对事实性的抵抗行动,没有对事实性的反抗,就没有诗的创造,事实性也就一无用处,事实性的无往不胜恰恰是事实性的真正悲哀。然而,在打破事实性崇拜或反抗事实性的问题上,布鲁姆却又采取了另一种略显诡辩式的论述,意在力求作出深刻而辩证的阐发:“一首诗歌在同事实性的战斗中,在反对以前的诗歌的限制性力量的过程中,所能使用的武器就是自由的姿态和立场,并且,对于一首诗歌来说,这些姿态和立场必定都是一些转义。这种限制迫使主体做迟来的诗歌的事情,……甚至最强力的诗歌其实都是诗歌的集合。这意味着甚至最有组织最有文采的诗歌也必然是断片的。事实性不仅能简约独创性和自律性,而且能简约统一性和自足性”<sup>[3]110</sup>。在此认知基础上,面对诗歌影响的事实性,布鲁姆的诗学倾向表现得既微妙,又明晰,他力图揭示诗人身上兼有的对事实性的确认与反抗,而在二者相反相成的张力之下形成的必然是他所谓的修正主义,正如他所断言:“存在的只是事实性和修正”<sup>[3]112</sup>。

因此,某种意义上,布鲁姆影响诗学的实质是“反影响”诗学,他一直在采取逆反式批评的思维做着诗学解析,藉此努力突出诗人修正行为中蕴藏的创造力量。在他看来,影响唯独在迟来诗人的自卫防御中方才显形,是焦虑产生影响,而不是相反。他着重强调:“影响的焦虑来自一种复杂的强烈误读行为,一种我称之为‘诗的误释’的创造性解读。”<sup>[1]14</sup>影响即焦虑即误读,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过程:“诗的影响——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sup>[1]31</sup>布鲁姆这一番经常为人所征引的名言透露出,很大程度上,与其说他所思的是诗,不如说是诗人。或者,从布鲁姆独创的“影响的焦虑”这一诗学命题言之,他真正的洞见即产生于某种对“诗人何为”的辩证性追问,在这一点上,他发现,诗歌创造之所以可能,最终依赖的是诗人自我的强力意志。

一方面,固然任何诗歌创造都必定处在时间的阴影之下,为影响的焦虑所浸染;但另一方面,“仅仅通过压抑的创造性的自由,通过最早对影响的关注,一个人才能重生为一个诗人。也只有通过修正,诗人才能变得并保持得越来越强大。”<sup>[5]26</sup>亦可见,布鲁姆时刻念兹在兹的创造性,实际强调的并不是全然的“新”,而是“强”,前者绝无可至,后者则真正标志着影响的生产性,这是“一种必然与历史传统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sup>[6]8</sup>,从中流露出的是布鲁姆对诗人个体的终极关切。于是,在布鲁姆的影响诗学视域下,诗史传统呈现为“一个在连续性的假象之下实施的自相残杀的过程”<sup>[7]6</sup>,迟来诗人无不充满个体自我不朽的渴望,纷纷挑起自我与先辈他者的审美竞争,文学场内争强逐力,战火连绵。在迟来诗人与前驱诗人的对抗中,布鲁姆又热切地称赞迟来诗人对时间的撒谎行为,因为这关系到对诗歌优先权或强力地位的争

夺,在当中他看到了迟来诗人得以获致原创性的唯一契机:“通过误读,我所说的影响,不是善意的传递,而是有意的、荒谬的误读,其目的就是清除前辈,为自我腾出空间。”<sup>[8]64</sup>

概括而言,布鲁姆的影响诗学至少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维度,即个体维度与时间维度,二者交织在一起又构成激烈的对抗。正是在个体与时间的对抗中,发生着迟来诗人对先驱诗人的转义或修正式误读行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其个体维度和时间维度都是被高度抽象了的,即,他所谓的诗人个体更多地只是一个迟来的身份,或者强力意志,而时间也是一个比喻,仅仅关涉着优先权的归属与篡夺。在个体与时间的对抗当中,所有语境性的东西都通约掉了,惟剩下无关利害的审美,供布鲁姆顶礼膜拜。这样一来,在布鲁姆那里,影响的生产性嬗变成审美原创性,并且只能通过所谓诗人个体的强力意志来推动达成。或许从此可见,布鲁姆“影响即误读”的诗学逻辑貌似开放,实际上潜藏着何其固执的精神封闭。所以,当我们看到布鲁姆的著述中频频涌动着愈益独断的批评话语,也就毋庸奇怪了。

总之,布鲁姆影响诗学的唯我主义和审美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免抽象琐碎的,使其丧失了语境主义所能触及的丰富多样的问题域。这势必极大地缩削了他对诗史的整体观照视域。

## 2 影响的诗史:反历史书写与互文性重构

作为一位强力批评家,布鲁姆一直怀有重构诗史的雄心,正如伊格尔顿所云:“布鲁姆所做的实际上乃是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重写文学史。”<sup>[9]183-184</sup>布鲁姆借用俄狄浦斯情结来隐喻先在诗人与迟来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他笃定认为:“诗的历史是无法和诗的影响截然区分开的。因为,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sup>[1]5</sup>

然而,布鲁姆的影响诗学给他提供的历史叙述框架,却或多或少是反历史的。至少他是反黑格尔的,尽管他同样讴歌否定的精灵,可是他不能接受黑格尔勾画的历史逻辑进程。非但如此,他还从个人主义和审美主义立场出发,刻意缩削历史,乃至将其化约为纯粹的时间范畴,仅仅意味着时间上的先在性。他笔下充斥的形形色色的心理学隐喻,无不诉诸诗人个体的强力意志,后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力图僭越先在,这便使得诗史似乎确定无疑的先在—迟来链条变得跳荡反复、难以厘清。如果说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等四部曲中还坚持指认所谓“亲本诗”,以建立先在诗人与迟来诗人、影响者与误读者的对应关联。那么,在《西方正典》一书中,他进而明确表示:“影响的焦虑无关真正的或想象的父亲是谁,它是借助于诗歌、小说或戏剧并在它们之中出现的一种焦虑。任何强有力的作品都会创造性地误读并因此而误释前人的文本。”<sup>[6]6</sup>在此,诗歌历史的具体在场被抽离,抑或至少被模糊、被虚化了。

布鲁姆甚至坦言:“我感到,后来者地位根本不是什么历史身份,而是属于文学坐标上的这么一个位置。有几派历史决定论者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中有的信仰马克思,有的信仰福柯,有的是政治女权主义者;他们基本上把文学作为某种边缘性的社会历史来研究。他们放弃了读者的独立存在性——这种主体性被认为‘不具有社会存在性’而遭到排斥。”<sup>[1]16</sup>以布鲁姆对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感,他最终放逐了历史的观念意识形态,而只保留了纯粹时间层面的历史措辞,而且在较多情况下干脆回避这类措辞。他对于诗歌影响的历史的论述,很快就转换为对于诗歌影响关系的论述。这样一来,尽管他所论述的诗歌影响关系主要是一种历时的关系,可是最大限度地删削了历史超乎个体审美之外的种种意味,从而终于巧妙而决绝地将历史拒之门外。

布鲁姆之所以对历史抱有疑忌,除了反感历史决定论之外,恐怕原因还在于他有意排斥一种长期积习造成的自上而下的历史思维,这种历史思维肯定了历史的压抑,导致某种事实性崇拜,惯于将诗歌影响描述成代代相袭、陈陈相因的过程。布鲁姆的影响诗学在事实性与修正之间建构了辩证的双向视角,并且着重强调诗歌影响关系的逆向度和对抗性,因此在否定历史压抑的同时解构了历史。进而,布鲁姆通过他的影响诗学对诗史做了改写,在他眼里,诗史毋宁只是诗的集合,而且是诗之间相互冲突的集合,是充满强力误读和审美竞争的诗歌战场。他甚至指出:“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

解。”<sup>[21]</sup>对布鲁姆这番话,有论者进一步阐释道:“所以不存在文本性,而只存在‘互文性’,……据此,虽然文本出现的时间有早有迟,但早出的文本不一定是影响者,晚出的文本不一定是被影响者。因为晚出者对早出者的误读或修改,实际上就是对早出者的影响。……既然影响意味着‘互文性’,也即意味着诗人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的实质也就是诗人间互相阅读,更确切地说是误读的关系。”<sup>[21]</sup>布鲁姆所揭示的这种误读的互文性,真正发扬了“影响即误读”的意义,甚而一定程度地逆转了时间向度,呈现出更具活力的自由交错的诗歌影响关系,而这样一幅影响的图景亦表明,布鲁姆在颠覆既往具有决定论色彩、凝固单一的诗史的同时,未尝丧失他对于诗史的一种强烈的阐释意志。

对于布鲁姆这种诗史阐释意志,有论者以不乏反讽的语调评论道:“他(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看上去并不复杂,不过是把诗人的修辞策略与心理对抗机制结合起来,以弗洛伊德家庭罗曼司的戏剧化的方式重述诗歌史。但实际上,‘影响的焦虑’是以一种最有效率的,近乎铁腕的方式把诗歌的历史紧紧地收拢在他的批评意志之下,‘影响’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解诗歌的语境已经被高度强化,读者在反驳他的观点之前就已经落入他设计好的修正与对抗的悖论之中。”<sup>[10]</sup>然而,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布鲁姆“重述诗歌史”之所以如此奏效,恐怕不止是出于他的“批评意志”,也不止是他对“影响”所做的“高度强化”,至为关键的是他将诗歌影响关系阐发为互文性——这无疑是一个更广泛、更有效、更具说服力、更普遍适用的阐释视角。

其实,布鲁姆的影响诗学一开始便隐含着互文性话语,并随其理论逻辑的次第展开,逐渐发露出来。而且布鲁姆在互文性关系中更注重差异性:“解释一首诗,你就必须解释它与其他诗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该诗生气勃勃地创造意义的地方,这是一种家族差异,一首诗正是借此差异来抵偿另一首诗的。”<sup>[2]</sup>75不仅如此,布鲁姆从互文性或文本间性,进而揭示诗人的主体间性,他的影响诗学“确实不仅远离那种认为存在着‘诗歌本身’(poem-in-themselves)的观念,也远离那种更为顽固的认为存在着‘诗人本身’(poet-in-themselves)的观念。如果说文本不存在,那么作者也不存在——做一个诗人就等于做一个‘诗人之间’(inter-poet)。”<sup>[11]</sup>114

但是,布鲁姆在以互文性来重新阐释他的“影响”概念乃至诗史构图时,依然是在审美与历史之间做了一种十分偏颇、非此即彼的取舍,他所认可和利用的只是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影响,对于诗史阐释而言,这远远不够。有学者深切认识到:“要区别开互文过程的两方面:一面是作为主体回应过去或现在的其他文学文本的内部互文性;另一方面是外部互文性,意味着通过主体对非文学的文本和话语进行加工。……内外部互文性在共同作用,文学不能单由自治的角度,由文学演进内部的生产来解释,它还是社会性事实并且因此成为社会学的对象:作为对政治、法律、科学、哲学和商业的社会方言和话语的反应。‘作品内部的阐释’和任何一种文学自治美学的根本缺陷都在于抹去了整个非文学的语境。”<sup>[12]</sup>71若以这段话观照布鲁姆,则不仅可见出布鲁姆固守内部互文性这一明显的偏失,而且也再一次暴露了布鲁姆影响诗学的理论硬伤,即其看似纯粹、实则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审美主义。在他的母国,“研究影响问题的美国文学界学者虽然都在运用布鲁姆的理论,但却从两个方面抵制了他的学说。其一,布鲁姆持‘内在影响论’,只关注作者对作者,及作品对作品的影响,忽视文化(‘高雅’文化和‘低级’文化皆然)、历史和思想等‘外在’影响。对此,他们基本上都加以抵制。其二,他们抵制布鲁姆影响论中的线性单一影响观,倾向于新的历史相对影响论,即认为影响具有多重性、异源性和复调性。这种研究将考察对象延伸到了传统欧美高雅文化以外的影响因素,去关注宗教、哲学、文学、文化和思想诸影响之间的重叠部分。”<sup>[13]</sup>126

毋庸置疑,布鲁姆的美国批判者们通过抵制和克服布鲁姆的诗学缺陷,表明了一种为影响的文学史构图填补更多空白的努力。对照于此,布鲁姆在影响诗学的视域下所作的诗史重构,愈益显露其阐释的限度,同时深刻地表明,如何平衡并化解审美与历史的矛盾,堪为文学史书写的一大难题,难以穷解。

### 3 余论:文学史的历史性及语境化

布鲁姆将影响诗学运用于诗史重构而产生的得与失,实际上触动了一个深刻命题:文学史书写,何以可能?——这是一个在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或建构、或解构、或重构的批评话语洗礼后,迄今依然并未穷尽

答案的问题。

文学史,顾名思义,即文学的历史,是以文学为特定对象的历史叙述,但是,文学史书写的根本症结恰恰孕育于文学与历史的种种悖逆之中。布鲁姆的影响诗学无疑创造了一种文学史“影响”观念的变革,且就“文学”在影响过程中是怎样地发挥着真正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具有深刻乃至典范意义的入思模式。然而,文学影响所涉及的,应是某种总体性关联视角下的文学场呈现。与此相反,布鲁姆的影响诗学视域,显然包含着从历史性向文学性的迁移,一定程度地割裂了文学的历史与形式,是对丰富复杂的文学场的绳削斧凿。在诗史重构中,布鲁姆肆意伸展着强力批评的触角,将文学史叙述统驭于文学批评意志之下,以审美的名义不惜僭越历史,甚至沦入某种解释学的独断。事实确乎如此,布鲁姆极力鼓动审美强力竞争,甚而有意冷落文学史的历史语境,作为文学史书写者,他却更喜操弄批评之笔,纵横捭阖,根本无意于以知识考古式的叙事策略来剖陈历史、还原在场。这样,布鲁姆在影响诗学视域下进行的诗史重构,毋宁说是以文学史为他的诗学穿衣戴帽,将文学史叙事变成一套诗学观念叙事,从而疏远甚或离弃了文学史固有的历史性。

诚然,对于文学史的历史性应作何理解,不应拘泥于字面。任何文学史书写,作为叙事,归根结底总是历史的目标建构之一种,抑或仅仅是可能的目标建构,折射着书写者千差万别的主体诉求。但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是,种种文学史叙事的目标建构毕竟都是在围绕一个特定的文学发展历程而做出的。在历史相对论风行至今、方兴未艾的当代视野下,文学史书写似乎永远只是可能的讲述,因而永远被延宕。其实,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后现代知识状况在文学史书写领域的某种表征。作为一门现代知识学科,文学史所踏上的,仿佛最终都是一条被放逐的不归路。然而,文学史尽管在后现代批判下日益暴露出自身内在的种种残缺,其存在的本体价值却无法剥夺,它一直是理解和把握文学发展历程不可替代的根本之道,毕竟历史认知是人类知识生产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对文学史的各种质疑和批判仍然是抱定某种对历史的笃信,期求着逼近真实完整的文学史形态。因此,文学史的历史性,恐怕始终是书写者不可偏废的立足根基。

当然,文学史作为叙事,总是出于种种原因做各种各样的取舍过滤,而文学史的对象空间是多元客观的,因此,在文学史书写中如何尽可能完整呈现这样的对象空间,保证文学史目标建构的广延性,意义十分重大。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去实现文学史的真正开放,在敞开的语境空间下进行书写。坚持文学史的历史性,更主要地也是力图促进文学史的语境化,不仅包括文学自身赓续兴替的独立语境,而且特别要顾及文学话语与其他相关话语交织并进的历史文化语境,在文学史叙述中形成审美与历史的积极对话,以此尽可能地涵容和展现文学史的丰富多彩与复杂多变,由此获取更能激发价值创造的文学史认知。某种意义上,这恐怕正是文学史书写在终极目标建构上可以企及的可能之所在。

#### 参考文献:

- [1]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增订版.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5-72.
- [2]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M].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77.
- [3]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M].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9-112.
- [4] 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2004,24(4):67-70.
- [5] BLOOM H. Poetry and repress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26-27.
- [6]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6-8.
- [7] ALTER R. More wrestling with forebears[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1982-1-31(6).
- [8] BLOOM H. Agon: 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M]. New York: Oxford UP, 1982:64-65.
- [9]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3-184.

(下转第93页)

## The Collaboration Model and Algorithm of Just-in-time Delivery Incentive Contracts Based on Response Time Uncertainty

Fang Zhongmin<sup>1</sup>, Chen Zhiya<sup>1</sup>, Zeng Minghua<sup>2</sup>

(1. School of Traffic & Transport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2. School of Railway Tracks and Transportation,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rategic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framework of supply chain, with game theory as the analysis tool, based on the dynamic interactiv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both parties, we establish the Stackelberg game model, in which the manufacturer is the main part, and the supplier is the minor one. Through the post-optimality analysis, we discuss the decision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just-in-time purchasing process and explor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for Stackelberg equilibrium solution under unconfined conditions. Finally, we raise the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of embedding interior point method for this game model.

**Key words:** collaboration; Stackelberg game; uncertain response time; incentive contract; simulated annealing algorithm

(上接第87页)

[10] 王敖. 布鲁姆的“最佳英语诗歌”[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6-2-24(10).

[11] BLOOM H. Kabbalah and criticism[M]. New York: Conn. Seabury Press, 1975: 114-115.

[12] 彼得·V·齐马. 比较文学导论[M]. 范劲, 等, 译. 1版.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70-71.

[13] 埃默里·埃利奥特, 克莱格·萨旺金. 美国文学研究新方向: 1980-2002[J]. 王祖友, 译. 当代外国文学, 2007, 27(4): 125-129.

##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etic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Harold Bloom's Influence Poetics

Yang Long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Harold Bloom's influence poetics focuses on the aesthetic activities of creating poetry, and actually elucidates the poetics of “anti-influence” by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facticity and revision under the proposition of “anxiety of influence”, thus ultimately making an inter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fluential poetic history with aesthetic transgressing over history. When reconstructing the poetic hist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Bloom's influence poetics, we fin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aesthetics and history and the contradiction is intensified because of his extremity on aestheticism, which causes it difficult to comprehensively represent the literary history. Such a problem about constructing literary history may be solved by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xtualiz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influence poetics; literary history; history; aesthetics; context